

# 文學的現代記憶

張新穎 著

三民叢刊

236

# 文學的現代記憶

張新穎 著

三民書局印行

##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文學的現代記憶 / 張新穎著. -- 初版一刷. -- 臺北市：三民，2003  
面； 公分 -- (三民叢刊; 236)

ISBN 957-14-3808-1 (平裝)

1. 中國文學－作品評論

820.7

92008948

網路書店位址 <http://www.sanmin.com.tw>

### ◎ 文學的現代記憶

著作人 張新穎  
發行人 劉振強  
著作財產權人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發行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電話 / (02)25006600  
郵撥 / 0009998-5  
印刷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門市部 復北店 /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重南店 /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  
初版一刷 2003年6月  
編 號 S 81097-0  
基本定價 參 元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

有著作權 不准侵害

ISBN 957-14-3808-1 (平裝)

# 自序

張愛玲

《文學的現代記憶》收長、短文十一篇。〈讀夏濟安私記〉寫於二〇〇三年，談張愛玲的〈日常生活的「不對」和「亂世」文明的毀壞〉寫於一九九九年，關於西西的〈反蘋果牌即沖小說〉寫於一九九七年。其餘的八篇，都是一九九〇至一九九二年間寫的，構成了這本書的主體。

回頭看這兩三年的文字，喚起了我青春時代愉快的讀書生活的記憶，那個時候我在讀比較文學專業的研究生，嘗試在二十世紀中外文學關係的框架下探討臺灣文學的現代意識。本書輯一的幾篇文章就由此而來。現在，我自己想起來都有些恍惚：當年，一個二十幾歲的年輕人，在上海一個叫南區的學生宿舍裡，讀臺灣文學。時間平靜無憂地流

I  
序自

逝著——可是，突然，要畢業了。本來準備要做的很多事，就此別過。

感謝三民書局印行這冊《文學的現代記憶》，它牽繫著我個人的青春記憶。

二〇〇三年五月八日

上海復旦大學

# 文學的現代記憶

## 目次

### 自序

### 輯一 臺灣文學的現代意識

論臺灣《文學雜誌》對西方現代主義的介紹

讀夏濟安私記

40

現代精神的成長

——對王文興小說創作主題的一種貫通

50

3

從焦慮開始

——歐陽子小說簡論 77

靈視之城

——羅門的詩和詩論 85

讀臺灣新世代小說札記

108

## 輯二 談張愛玲，談西西

日常生活的「不對」和「亂世」文明的毀壞

——四十年代張愛玲創作中的現代「恐怖」和「虛無」

傾城情譜未 盛世人飛灰

——兩個香港故事的參照閱讀筆記 170

145

張看，看張

——張愛玲小說三題 185

無辜的石頭

——西西《致西結福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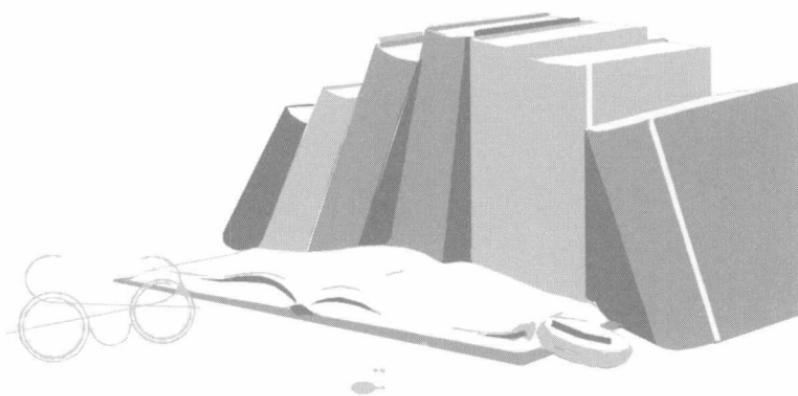
211

反蘋果牌即沖小說

——西西《「洛神賦圖卷」答問》

219

# 輯一 臺灣文學的現代意識





# 論臺灣《文學雜誌》對西方現代主義的介紹

## 引言：研究背景與基本立場的簡單交待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區別於傳統文學的開放性，使中外文學關係的研究成為一個必然的課題。通常，我們會不自覺地把這種「關係研究」視為在文學的「外部」進行的學術探討。其實，需要對這種不自覺的意識提問：什麼是與此相區別的「內部」研究呢？於是，一個虛假的基礎就顯露出來：即先驗地把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當成一個獨立、封閉、自律的系統，有這樣一個假設的系統，才有系統的「內」／「外」之別。無需論證的是，不存在這樣一個封閉的系統。如果要把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看成一個整體，看成一個文學史的發展過程，那麼中外文學關係就包含在這個整體之內，參與到這個發展過程之中，

不存在「內部」／「外部」的二元對立。相應的，也就不存在由「內」／「外」之別而隱含的不同研究活動的意義大／小、價值高／下、方向主／次等等的區分。

這樣一來，「中外文學關係」的提法本身就只能是權宜性的、策略性的。因為外國文學參與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發生和發展，滲透其中，交融匯合，如果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視點，就不可能清楚地分辨（也即強行地割裂）它自身的哪一部分為「中」、哪一部分為「外」。但是在達到融合之前的階段，即傳播、介紹與接受的過程中，傳播主體與接受主體的區分自然是十分明顯的。然而這個過程本身不可能是文化交流和文學交流的目的，這一階段注定要被超越。強調這一點看來似乎是重複廢話，其實我想由此引發出以下的想法：傳播與接受的階段是比較文學研究關注的重要環節，但我們在做此種研究時的觀念與意識不能停留在這一階段提供的兩種文化或文學的二元狀態，而應該擁有所超越了這一階段的融合狀態所提供的觀念和意識，並以此來返觀這一階段。一般說來，可能有三種狀態或層次的觀念與意識：第一，只認識到中國文學的存在；第二，認識到中國文學之外還有外國文學；第三，中外文學融匯造成二元對立的瓦解，有可能由此接近一種「世界文學」的理想，中國文學和其他各種文學都分別是「世界文學」的一部分，

而且是各具特色的部分。二十世紀，人類日益發現自身的處境、面臨的問題是共同的，世界一體的觀念在越來越多的事實上被發現、證明，也贏得越來越多的精神認同。各國別與民族文學勢必不能維持雖然有所「交往」但依然「各自為政」的「對立」狀態。

本文論述臺灣《文學雜誌》對西方現代主義的介紹，兼及雜誌時期的現代小說創作，就是放在上述的研究空間（二十世紀中外文學關係）與基本立場之下進行的。雖然這只是「史」的進程中的一「點」，落實於文字的闡說仍然直接牽連著「無文」的研究背景。

## 《文學雜誌》誕生前後的臺灣文壇簡述

五十年代西方現代主義在臺灣的傳播及影響，放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與外國文學的關係的大過程中來看，是對自世紀之初、特別是「五四」以降介紹與接受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開放傳統與精神的接續，這種接續的意義在同時代大陸背對世界現代文化的情形參照下尤顯重要。

事實上，國民黨政府遷臺後，臺灣的社會現實有利於現代主義的引進並產生影響。當時「收復大陸」的口號和政策，一方面加強了大陸遷臺人士過渡時期的感覺，另一方

面造成了與土生土長的當地民眾的疏遠，「臺灣的『多數人』都需求逃避現實的活動；他們無意面對前途不明的政治現實。他們與外界隔絕，政治上遭遇種種挫折，又找不到適當的解決之道，於是在臺灣的中國作家——大陸人和臺灣省人都一樣——漸漸轉向內在，『生活在感官、潛意識和夢幻經驗的個人世界中。』」<sup>①</sup>

從文學自身的狀況看，當時的文壇充斥的是官方極力推行的「反共八股」，再就是坊間氾濫的胡編亂造的男女私情，文學不是墮落為政治的附庸，就是降格成庸俗的消遣品乃至低級下流之物，鮮有真正的文學。有識有志之士自然不甘心文壇荒蕪，他們尋求力量，需要借助它來改造文壇。其時，中國新文學作品被全面封禁；而曰據時代的臺灣作家正面臨從日文換到中文寫作的轉折，不僅語言障礙使他們難有較大的貢獻，而且殖民文化和文學本身需要改造，其影響需要消除。情勢逼迫，幾乎只有「別求新聲於異邦」一途，再加上當時的社會心態，現代主義自然而然應運而來。

《文學雜誌》就是在這樣的背景和條件下誕生的。其時，臺灣文壇已經開始營造現

① 李歐梵，〈中國現代文學中的現代主義〉，收入《中西文學的回憶》，三聯書店香港分店，一九八六年版。

代主義的氛圍，主要是些詩人的借鑑與實驗。早在《文學雜誌》之前，即一九五三年二月，紀弦創辦《現代詩》雜誌，一九五六年成立「現代派」，紀弦擬定「現代詩社」六大信條，除第六條為反共的政治訓誡以外，其他五條為：

第一條：現代詩詩社要「揚棄並發揚光大地包容了自波特萊爾以降一切新興詩之精神與要素」。

第二條：他們認為新詩「乃是橫的移植，而非縱的繼承」。

第三條：他們強調「日新又新」——「詩的新大陸之探險，詩的處女地之開拓，新的內容之表現，新的形式之創造，新的工具之發現，新的手法之發明」。

第四條：他們同樣強調「知性」：他們認為現代主義的特色之一是「反浪漫主義的。重知性，而排斥情緒之告白」。

第五條：他們也追求「詩的純粹性」，「排斥一切「非詩的」雜質，使之淨化，醇化，提煉復提煉」。

六十年代之前，在《文學雜誌》誕生前前後後一段時間內，創刊的提倡現代主義或帶有明顯現代主義傾向的文化、文學雜誌還有：《創世紀》詩刊（一九五四）、《藍星週刊》（一九五四）、《藍星月刊》（一九五七）、《文星》雜誌（一九五七）、《筆匯》綜合文化月刊（一九五八）等。

但《文學雜誌》的出現，不只是在已有有的倡導現代主義的聲音中再加進一種聲音而已。說輕一點，這樣一種學院派雜誌有自己特殊的介紹現代主義的方法與策略，有特殊的意義和影響，甚至，它並不是以現代主義的激進面貌出現的；說重一點，引用李歐梵的話，也是一般公認的看法，即：「《文學雜誌》的發行，在臺灣的中國文學史上，是個重要的里程碑。」<sup>②</sup>

## 夏濟安與《文學雜誌》的現代主義取向

《文學雜誌》四卷六期發表了夏濟安的一首詩〈香港——一九五〇〉，這首詩有個引人注目的副標題，叫「仿 T. S. Eliot 的 Waste Land」。詩的前面，陳世驥著文〈關於傳統・

② 李歐梵，〈中國現代文學中的現代主義〉。

創作・模仿」，評價此詩；詩的後面，作者附文詳細說明了這首詩的創作情況和詩的具體涵義。重提此事，用意並不針對〈香港——一九五〇〉本身，而是想借機探討夏濟安對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基本認知與心態，進而展開論述《文學雜誌》對現代主義的介紹。作為《文學雜誌》的主編和六十年代盡領文壇風騷的「大學才子」(College Wits)們心目中的導師，夏濟安的認知與心態超出了單純個人的意義，影響了及一個時代的文學風尚。

陳世驥「說〈香港——一九五〇〉不稱為是『奇文』，也不泛說是『好詩』，而是一首相當重要的詩。其重要性在於其為一位研究文藝批評的人有特別意識的一首創作」。「明顯的方法意識，在我們的這一切價值標準都浮游不定的時代，總是需要的。『它』即使本身不被用作一首詩的榜樣，可以至少是現在作詩態度的一種榜樣。」陳世驥強調出來的「特別意識」、「明顯的方法意識」、「作詩態度」就是指對艾略特〈荒原〉的模仿，但模仿的對象卻不是〈荒原〉本身，「而是〈荒原〉背後的詩的傳統意識之應用與活用。」這種「傳統意識」，「反對無紀律的浪漫，反對浮淺稚氣的唯新」，「在形式上，成就一種新的語言；在內容上，表現出唯有現代所有的情感與眼界。」這樣一種老成的、表面上甚至帶有保守色彩的現代主義文學觀，基本上認同於 T.S. 艾略特在經典論文〈傳統和個人